

比较文学文库

汪介之◎著

Wen Xue Jie Shou Yu Dang Dai Jie Du

20 Shi Ji Zhong Guo Wen Xue Yu Jing Zhong De E Luo Si Wen Xue



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

——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项目

“文化变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研究成果

比较文学文库

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

——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

Wen Xue Jie Shou Yu Dang Dai Jie Du

20 Shi Ji Zhong Guo Wen Xue Yu Jing Zhong De E Luo Si Wen Xue



汪介之◎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文学接受与当代解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 / 汪介之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比较文学文库)
ISBN 978-7-303-11337-8

I. ①文… II. ①汪… III. ①文学—文化交流—中国、俄罗斯—20 世纪 IV. ①I209 ②I5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4328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20.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赵月华 李雪芹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言

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 世纪的历史更把这种交往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以及在 20 世纪的成长、发展和演变的整个过程，始终伴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然而，在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不仅中俄两国的历史道路都充满着曲折与坎坷，两国文学各自的进程也同样处于动荡起伏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文学彼此之间的交流、传播、接受和影响，便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如今，身处 21 世纪初叶，回望这百年来的文学交往史，我们既可以窥见那曾经使人感奋的灿烂的朝霞，那一度充满收获喜悦的金色的原野，也能够看到浓重的阴云和令人惊悸的险滩，还难免涌起面对落日余晖和苍茫暮色时往往会油然而生的那种留恋与惆怅。但是不妨说，正是这一切交织而成的丰富与厚重，给我们深入考察两国文学及其关系史，留下了无尽的空间和说不完的话题。

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面对的俄罗斯文学，其本身是一种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客观存在，又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实体，而中国文学对它的接纳，则显示出作为接受主体（接受者民族）进行选择的目光。这种选择的结果，往往既表明了某种摄取侧重和价值取向，也必然有所舍弃、排拒和失落，甚而有这样那样的偏颇或变型，并且在总体上呈现出随着历史的变迁而转换的阶段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接受主体的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等“先结构”，接受者民族的现实需求及其所处的时代氛围，等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的现实需求则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因此，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接受与理

解的俄罗斯文学，就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为客观现象存在的俄罗斯文学本身。考察这一接受过程及其偏重和遗落，正是梳理中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史，乃至整个中俄文学交流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再者，由于俄罗斯文学自身的复杂构成以及制约文学的社会生活的动荡与时代氛围的变化，这一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实际影响，必然是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不同作用和效果。纵观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联系中俄文学的丰富实绩，不难看出俄罗斯文学的主导精神、创作方法、体裁样式、形象系列和艺术风格诸方面，都对 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有益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才几乎一致地把俄罗斯文学视为自己的导师和朋友。但是，庸俗社会学的泛滥，“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先后兴起，极左文学路线和文艺政策的强制推行，个人崇拜的猖獗，却不仅把俄罗斯文学本身带入了一个暗淡的低谷，而且给中国文学的发展迅速造成了有害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一个长时期内中国文学发展的停滞状态。人们终于不得不承认：中国新文学既深受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滋养，又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饱受其极左化之害，从指导思想、理论批评到创作实践和读者接受等各个层面，概莫能外。清理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成为总结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历史经验的又一重要侧面。

对于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所出现的以回归、复苏和重评为特征的种种文学现象，无疑是最难以忘却的文学接受体验之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于社会、文学和感受的领域。人们记忆与印象中的旧有文学史图像被刷新了；一些声名显赫的文坛要人很快就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光环和荣耀；许多陌生的作家、诗人连同他们的作品纷纷破土而出，以其思想力量和美学风范在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长时期以来被认做天经地义的文学观念以及关于它们的连篇累牍的阐释，遭遇到怀疑、否定和抛弃。在中国文学界和读者面前出现的，既是俄罗斯文学本身的一个新阶段，也是要求人们重新认识俄罗斯文学，特别是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时代。于是，重识经典、重评作家、重构文学史，一时间便成



为研究者、评论者们的经常性话题，成为他们思考的热点。白银时代文学、俄罗斯侨民文学（俄罗斯域外文学）、在苏联存在的 70 余年中的不同时期遭到批判和封闭的大批作品，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名噪一时的“开放体系”显然已风光不再；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和巴赫金的诗学思想等在内的一度被忽略、被遗忘的理论流脉上升到文学的地表，如此等等，于是，中国读者心目中的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面貌便悄然发生了变化。就研究者、评论者们而言，他们一方面急切地希望了解当代俄罗斯学界在重新考量、重新估价其本国文学时所发掘的新文献、新材料，所提出的新观点、新思路；另一方面则忙于补读一部又一部的回归之作，同时还驱使自己重新面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些作品文本，力求经由这些阅读以获取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可靠的新认识。当然，由于诸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和意识、思维的惯性，这种重新评价，这种文学上的价值重估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尚需要未来历史的检验。

不过，对于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审视，决不像某些人所推想的那样，只是一种类似于“翻烧饼”的工作。非白即黑、河东河西的简单轮回，不应成为我们看待文学史现象时所遵循的思维方法。问题只是发生在：当人们意识到把阶级斗争的观念引入文学领域，以极左政治的标尺评判作家作品必将导致文学的凋零时，就开始深感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思想史视角和美学—艺术视角相统一的重要性。在我国，以这种视角重新考量俄罗斯文学不仅需要合适的社会精神气候，其自身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细致和韧性的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是“想当然”地颠倒一下即大功告成。这一进程及其意义，令人联想到欧洲 18 世纪的启蒙学者们摆脱神学的羁绊，把一切都放到理性的天平上加以检验的真诚努力，也令人联想到前一个世纪之交德国诗人兼思想家尼采发出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就重新检视俄罗斯文学而言，呼吁或呼喊无疑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历史文化转换期，但更需要的则是呼唤和倡导之后的踏踏实实的工作。这一工作我们当然还远远没有完成。

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重新估价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性，使

人们较容易忽略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学的进一步解读，忽略对于过去百余年间俄罗斯文学的不同板块、各个流脉、各种潮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忽略对于苏联文学本身的再度考察。这样的情景确实发生过，尽管这也是在大变动的背景下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是，中国读者毕竟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希望通过研究者、评论者们了解更多的东西，比如，当今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那些经典作品？相比之下，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究竟为人类提供了哪些真正的经典？延绵 70 余年的苏联文学中，究竟有哪些不应忘却的遗产？俄罗斯，我们的这一庞大的近邻，其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和精神诉求等，究竟怎样制约着其文学的进程和特质，又怎样表现于文学？这同样是我们的研究者、评论者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广泛使用，加上苏联解体的历史真实，使得“苏联文学”这一原有概念面临着被逐渐淡忘的命运。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的“苏联文学”，即便历来人们对它的评说千差万别，对这一概念之内涵的解释也各有不同，但它的价值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界曾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过多次有意义的学术讨论，而在范围更为广阔的欧洲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乃至一般外国文学史的编撰中，人们也往往从不同的侧面涉及与此相关的论题。这一现象让我们不禁想起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所说的话：“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有明显的谬误。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因此，“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必须重新写过。”两位学者还强调：“如果仅仅用某一种语言来探讨文学问题，仅仅把这种探讨局限在用那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和资料中，就会引起荒唐的后果。”^①毫无疑问，这种开阔的文学视野，这种高屋建瓴的眼光，正是

① [美]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44～47 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我们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和其他国别文学研究所迫切需要的。

本书正是笔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思考上述诸问题的一份笔录。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离不开对作品文本的解读，离不开对具体文学现象的阐释，解读和阐释本身就是一种接受。如果说，任何个人的接受与解读都不过是一种对话的素材，那么，笔者所希望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文字和同时代人一起继续讨论、继续思索关于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关于 20 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等这些饶有趣味的话题。



目 录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 一、俄罗斯文学精神与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的形成
- 二、中国文学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多元取向
- 三、百年俄苏文论在中国的历史回望与文化思考
- 四、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
- 五、巴赫金的诗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流布

第二章 中国视角：重新审视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 一、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现状
- 二、关于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反思
- 三、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建构
- 四、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重新认识

第三章 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研究

- 一、当代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热点
- 二、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
- 三、白银时代诗人与作家群像
- 四、俄罗斯流亡文学与本土文学的血缘关系
- 五、俄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流变



159	第四章 中国文学视野中的俄罗斯经典作家作品解读
159	一、普希金《黑桃皇后》的魅力与价值
164	二、第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品
181	三、当代俄罗斯高尔基研究透视
197	四、关于高尔基思想与创作的再认识
203	第五章 俄罗斯文学的文化阐释
203	一、东西方问题的考量在 20 世纪文学中的延伸
218	二、关于俄罗斯灵魂的对话
229	三、弗·索洛维约夫与俄国象征主义
244	四、高尔基与别雷：跨越流派的交往和沟通
257	五、苏联文学与民族文化心态批判
280	附录 俄罗斯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280	一、我国俄罗斯文学史研究的一部权威性著作
287	二、新老《欧洲文学史》比较阅读印象
297	三、国内外国文学史编撰中存在的问题
308	四、“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320	后 记

第一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对 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一、俄罗斯文学精神与中国新文学 总体格局的形成

在中国新文学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有着外国文学的多元的、复杂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无疑是文艺复兴以后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这一历史现象对于我们考察中外文学关系，认识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赖以形成的外部条件，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新文学在摄取外国文学时，把目光着重投向俄罗斯文学，这并非偶然现象。文艺心理学在论及审美心理时，有“审美习惯心理”与“审美探究心理”之说。从审美主体（读者）的角度而言，前者过强，即造成审美意识的守旧，排斥文学中的变革与突破；后者过盛，则造成追逐“新潮”，盲目赶时髦。在这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可能是最恰当的审美心理，虽然这也因人而异。从审美对象（作品）的角度来看，过于迁就“习惯心理”，常由于内容与手法的陈旧而令读者生厌；力图迎合“探究心理”，则往往因过于“新潮”而令人不知所云。最能够被广泛接受的作品，可能是位于人们的“习惯”与“探究”心理之间的作品。正是这两种心理制约着、决定着人们的审美接受水平。如果说，一个民族也有一定的审美接受水平的话，那么，它最容易、最乐于接受的往往是符合这一水准的外来文学。这种外来文学，一方面应当是来自一个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状况有着某些相近之处的民族，它比较接近本民族的审美习惯心理；另一方面，它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上，又有

一些新的成分和因素，可以满足本民族的探究心理和求新意识。当中国新文学开始起步，并将求索、选择的目光投向周围世界时，它便发现俄罗斯文学是最符合本民族审美接受水平的文学。

中俄两国有很多相近之处。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长时间内都是农业国。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才获得中等程度的发展，比中国稍稍先进一些，但无法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中俄两国的封建制度都延续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进入20世纪，两国的反封建任务都还远未完成。因此两国人民的反封建、争民主的意识是共同存在的，而俄国的觉醒又稍先于中国。经济、政治条件的接近，使中俄两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俄罗斯是半个东方国家。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中俄两个民族的观念形态、思维习惯、心理特点和情感表现方式，都颇为接近。人们有一种朦胧的变革愿望，却苦于无路可走。宿命论、无为主义、理智的惰性与个人责任感的不发达，是两个民族国民性共同的病弱特征。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又略早于中国。两个民族中较早接触到先进思想和文化的有识之士，都欲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推动本民族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中俄两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是思辨哲学不发达，仅在“实用理性”方面有一定建树。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不明显。这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情况恰恰形成对照。在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革命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在德国，以康德为起点，由黑格尔总其成的“古典哲学”，带来了本民族思想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使得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法国笛卡儿的唯理主义，英国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和美国爱默生的超验主义甚至铸造了、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中俄两国却缺乏这样的大哲学家，文学不得不承担在其他国家通常是由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所担当的任务：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启迪民众，唤醒人心。在俄国，文学成为“唯一的讲坛”。在中国，“文以载道”是历代几乎所有文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只是“道”的具体内涵。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同的地位与作用，使得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文学家的眼中显得特别亲切；它所发挥的作用，更为中国作家所

瞩目。

上述诸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着重摄取和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内在必然性。

中国新文学的伟大先驱者和旗手鲁迅早就认识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先知先觉者，在建构我国文学的新格局，将中国文学引向现代的过程中，是以俄国文学为主要参照系的。鲁迅本人即是卓有成就的俄国文学翻译家、研究家和介绍者。茅盾、瞿秋白、郑振铎、巴金、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译介、研究俄国文学方面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叶圣陶、老舍、曹禺、周扬、冯雪峰、蒋光慈、王统照、艾芜、张天翼、路翎、田汉、夏衍、丰子恺、陈白尘等人，都同俄罗斯文学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正如他们的文学活动，不是单个人的活动，而是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对俄罗斯文学的选择、译介和吸收，也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融汇到了建构中国新文学的体系这一框架中。所有这些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均以各具个性色彩的个人接受，为中国新文学总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或许不一定是自觉的。于是，我们便看到，在中国新文学的总体格局中，清晰地呈现出俄罗斯文学的渗透与滋养。从宏观上考察中俄两国文学，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着许多相近、相似的精神、基调和特色。

（一）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是反封建斗争的理论表现。中俄两国人民反封建的共同历史任务，决定了两国文学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以普希金为先导的 19 世纪俄国文学，始终把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俄国文学繁荣的开始，正是俄罗斯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开始。俄国作家曾张扬个性主义，意在反对封建传统对人的扭曲，对人性的扼杀，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个性的价值。但是他们并未局限在个性解放的圈子里，而是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反对社会压迫，主张人人平等与自由；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理想。因此，俄国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便是暴露封建专制农奴制的黑暗，揭露贵族统治者的罪恶，描写下层人民的不幸与苦难，表现普通人的美好而丰富的精神世界。由于俄国民众力量反封建的斗争贯穿整个 19 世纪，延伸到 20 世纪，因而全部俄国文学便显示出与社会解放运动相联系的特色。这种联系使它获得了活命之水，使它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当代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俄国文学从题材、人物、主题，到体裁、语言等，都显示出民主主义、人民性的特点。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和大师们注意到了俄罗斯文学的这种特点。鲁迅先生说：中国作家从俄国文学中，“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辛酸、的挣扎”，并且，“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认为，这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鲁迅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俄罗斯文学的仰慕与尊崇，首先在于它的民主主义精神。

以“五四”新文学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在鲁迅等人的引导之下，同样把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中国新文学高举“五四”的民主旗帜，经历了从张扬个性主义到推崇人道主义，再到正面表现新民主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国新文学起步之初，曾侧重于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实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肯定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的权利；继而则着重暴露阶级压迫的残酷性，描写统治者的残暴堕落与下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幸，强调后者也是人，甚至在精神上、道德上更为高尚，为“小人物”呐喊；后来，又转向较多地正面表现工农革命运动，知识分子的抗争，以迫害与反迫害、镇压与反抗、挣扎与崛起为常见的主题。对中国新文学 30 年历史的纵向考察，使我们不难发现它同现代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是大致同步的，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民族良心和艺术良心的中国现代作家，不可能维护封建主义，不可能偏离现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全部中国现代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一样，浸润着民主精神。与民主主义精神相联系的平民意识，也共同存在于中俄两国文学中，主要表现为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力求表达人民大众的情绪和呼声；描写知识分子往往从他们与人民的关系，他们对人民的态度这一角度出发；尽量采用能为普遍读者所易于接受的艺术

形式。

(二)“为人生”的主导意向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显示出“为人生”的鲜明意向。文学“为人生”，就是对人、对人的命运、对民族命运的关注。文学是人学，也理所当然地要反映人的生活 and 命运，表现人的思虑和情怀，为人的解放，为人性的健全发展而呼喊。从“为人生”这一主导意向出发，俄罗斯文学在“社会批判”和“民族文学心态批判”这两个层面上得到了全面的拓展。在“社会批判”的层面上，俄罗斯文学围绕“社会与人的冲突”这一主题，描写了社会压制人、戕害人、扭曲人的现实，其基本思想指向是改变现存社会制度，重新安排社会秩序。在“民族文化心态批判”这一层面上，俄罗斯文学着眼于“人性美点与陋习之间的冲突”，描写了一系列“几乎无事的悲剧”，揭示出由历史积淀形成的人们的习惯心理、思维定式和处事方式，正是阻碍人们自身发展完善的无形网索，也是民族历史前进的障碍，意在促进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提高。果戈理、尼·乌斯宾斯基、格·乌斯宾斯基、契诃夫、布宁和高尔基等，在这一方面都颇有成就。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俄罗斯文学，充分显示出“为人生”的主导意向。

中国新文学着重摄取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着眼点也正在于此。鲁迅曾指出：“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茅盾也曾经写道：“俄人视文学又较他国人为重，他们以为文学这东西，……不但要表现人生，而且要有用于人生。”鲁迅、茅盾等人的阐释、倡导与示范，为中国新文学“为人生”主导意向的确立开辟了道路。“文学研究会”在这方面也建立了不可否认的功勋。这一组织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为人生”。从“为人生”出发，这一派作家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他们认为“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强调“在被迫害的国度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痛苦以及新旧

两代思想上的冲突。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另一重要团体“创造社”，一般被认为是尊重天才、为艺术而艺术、注重表现自我的。它的主要成员受“狂飙突进”运动和19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甚至有一些唯美主义倾向。但他们又不同于欧洲浪漫主义者，更有别于唯美主义者。他们的作品大都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与民主色彩，关注现实，并不脱离“人生”，特别是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而他们两人都受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影响。国内有的研究者曾对鲁迅、郁达夫作过比较研究，认为他们都是注重表现社会人生的，但表现的角度不同：鲁迅是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整体出发，从整个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改造出发对当时的社会人生进行艺术表现的；郁达夫的小说则是从个体对自我幸福的追求出发表现社会人生的。这是他们从两个不同角度所进行的人生开掘。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中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郁达夫的《沉沦》则是第一本白话小说集。立足于现代小说源头的两大作家的追求与探索，显示出“为人生”事实上是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主导意向。

与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意向，并不限于在社会批判和民族文化心态——国民性批判两个层面上展开。毫无疑问，这两种批判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思想内容。但是20年代末“太阳社”的出现，随后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与活动，则给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对革命武装斗争的正面表现，对人民英雄主义的热情歌颂。如果说，俄罗斯文学的主要功绩在“暴露”和“批判”上，那么中国新文学，特别是30年代以后的文学，则在“暴露”和“歌颂”两个方面显示出它的内容特色。而且，中国新文学的批评锋芒，在鲁迅去世之后，更集中于社会批判上。在这当中，有着民族现实需要的制约作用。

（三）使命意识：作家创作活动的内驱力

由于俄罗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俄国作家大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与职责，往往有一种“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唤起民众觉醒的自觉意识。这种使命感是俄国作家进行文学活动

的主要内驱力。俄罗斯文学与“纯艺术论”、唯美主义常常是格格不入的。十二月党诗人曾经以充沛的公民激情铸成昂扬的诗句，召唤人们同沙皇暴政作斗争。普希金是追求和讴歌自由的歌手，曾在自己的诗作中直接抨击沙皇本人。诗人涅克拉索夫曾写道：“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他的几乎全部诗作都用于唤起人民的觉醒与反抗，因此被称为“公民诗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将文学作品看成“生活的教科书”，正是强烈的使命意识驱使他在监禁和流放的艰难条件下写下了小说《怎么办？》和《序幕》。列夫·托尔斯泰自觉地担当起千百万俄国农民思想情绪表达者的重任。契诃夫一生致力于同俄罗斯人的“庸俗”作斗争，力求使人们看到自身的文化心理弱点，呼唤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高尔基则将“唤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作为文学活动的目的。他的社会批判，使他遭到盯梢、逮捕和监禁。他的民族文化心态批判，又招来许多误解和攻击。他可以舍弃一切，唯独不能忘却自己的使命。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俄罗斯文学那样出现过如此众多的革命者、思想领袖、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的形象。俄国作家的叛逆性格和批判精神，使他们往往逃脱不了被捕、监禁、流放、苦役的命运。赫尔岑说得好：“我们的全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正是使命意识使俄国作家的创作有了强大的动力，使他们具备了不向命运低头的意志品质。

中国现代作家的使命意识固然不只是外来影响的产物，但俄罗斯文学、俄国作家作为一种典范或参照，无疑是强化了中国作家的使命感。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一段大家所熟悉的话，谈及自己弃医从文的思想动因，即通过“提倡文艺运动”来改变国民精神。他后来还多次重申：“救国之道，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是怀着改变国家精神、“立人”的使命意识而投身文学活动的，这种使命意识制约着他的全部创作。另一现代著名作家茅盾也有着明确的社会政治理想，他的文学活动是同他实现这种理想的努力相联系的。巴金离开社会政治生活似乎较远，但他却以其创作为人们认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提供了逼真的图画，并力求让人们透过浓重的夜色，看到理想未来的曙光。左联五烈士更是